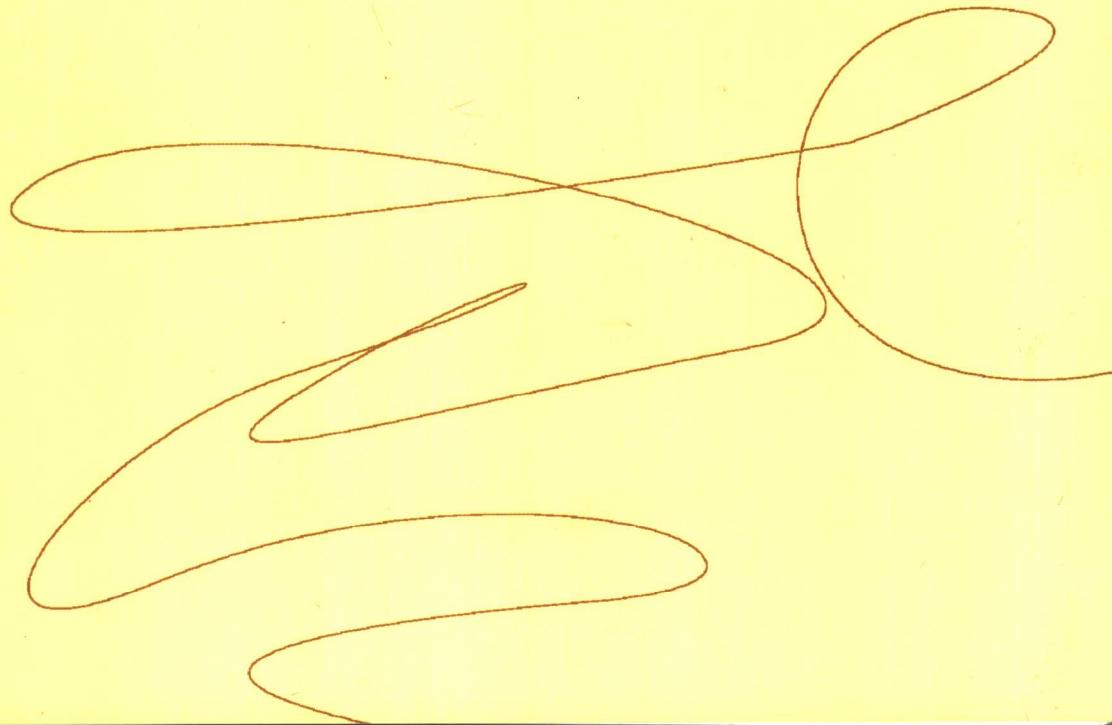


友谊凤凰丛书
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堂

國學





友谊凤凰丛书
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堂

國學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大讲堂·国学 /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 —北京：中
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5

ISBN 978—7—5057—2321—4

I . 世... II . 凤...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自然科学—
文集 ③国学—文集 IV .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7712 号

书名	世纪大讲堂·国学
编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20 毫米 16 开
	18.25 印张 278 千字
版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21—4/G · 259
定价	29.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鳳凰書品

出版策划：张林 邓康延
文稿统筹：邓康延

主持人：曾子墨 许戈辉
阿忆 王鲁湘

《世纪大讲堂》栏目组：
简承渊 吴菲菲 杨新烨 张恒

出版人：佟晓滨
总监制：史宝明
责任编辑：马瑞
封面设计：卡门
内文设计：海云书装



- “李敖有话说”系列 1—5
- 快意还乡——李敖神州文化之旅
- 十二天·心灵之旅——李敖 365 句智慧语录
- “唐人街”系列——唐人街故事／歌舞伎町案内人
- “冷暖人生”系列——之一／之二 /2006
- “凤凰大视野”系列——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实录
／从蒋经国到陈水扁／风雨人生样板戏
- “文涛拍案”系列——卷一／卷二
- 中国邻邦大扫描
- 文化大观园
- “鲁豫有约”系列——伊人／面孔
- 军情观察
- “凤凰企业文化”系列
——凤凰魂／凤凰秀／凤凰术／笑骂凤凰
- “世纪大讲堂”系列——国学／流变／清议

在热闹处安静听

刘长乐 /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世纪大讲堂”开讲六年多，已有三百多位演讲者登台，四位凤凰卫视主持人接力主持，千百学生现场听讲提问，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我们的民族，在这个娱乐成风的时代，需要更多的高端文化品质的浸润和引悟。

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对它后来的影响力我曾称为“意外的成功”，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是方法，也是态度。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于是，一堂堂相对静态的演讲，被传播放大，又以思想的厚重支持了传播，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惠泽于四野。

如果说生命个体原本是有限的常数，不可估量的变量正在于她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路径，对于主讲者和聆听者都是如此。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还是从几滴水中领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他们在讲堂相遇，都应是生命的盛事。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张弛有度的节奏掌控，将那山河之间，化作了行云流水。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时代敬重毕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学问家，也敬重那些崇尚知识和品质的莘莘学子。这些交流，是述者的知识之光数十年聚能的一朝发散，也是听者的人生阅读的一次循道捷径。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选择“世纪大讲堂”历年经典演讲，分类编纂，经纬梳理，纵横捭阖，并约得演讲者各自的观点新文，荟萃为《国学》《流变》《清议》各篇，这些当今大中华的思想风华，在讲堂讲述、电视传播、文本精编中，厚积而薄发，宁静而致远。

世纪大讲堂，因之余音袅袅。

国学

目录 CONTENTS

在热闹处安静听 刘长乐 1

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彭林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 严文明 19

道教之真精神 卢国龙

周易之象 刘大钧

禅宗哲学象征 吴言生

佛教智慧的真义 星云大师

佛教与中国文人 陈洪

佛教与现代社会 楼宇烈

國學

世纪大讲堂

文明的冲突与共存 汤一介

137

中医与传统文化 刘力红

153

中医的传统和出路 陆广莘

167

千年古墓之谜 韩伟

181

风水学与中国生态智慧 雷锋

203

理想人居——天地、人、神的和谐 俞孔坚

231

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王学泰

253

星占学的科学考察 江晓原

271

彭林

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彭林简历

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等。

曾子墨：有一位美国朋友，一直钟情中国传统文化，学了几年中文后，不远万里来到了北京。前几天我碰到他的时候，问他对中国的印象，没想到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奇怪的答案，好像他所认识的韩国人比他所碰到的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后来我才明白，他在北京认识的很多韩国人比中国人更注重礼节，更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

的确是这样，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崇尚“礼”的民族，但是在物质文明急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这个“礼”字有意无意被中国人渐渐淡忘了。这个“礼”字到底传承了一种什么样的儒家文化？我们请到了彭林先生为我们解读。

彭先生，您去过韩国、日本，您觉得与中国内地相比，人的行为方式有多大不同？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彭林：中国与韩国、日本的“礼”，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中国有五千年文明，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称号，韩国、日本的礼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被他们整个吸收了，融化在生活里面，也融化在他们历史里面。在韩国，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由于有了“礼”这样一个东西，人们彼此尊重，互相礼让，显得比较有修养，社会秩序也非常和谐。中国台湾也是这样，不光行为举止彬彬有礼，而且在谈吐上也比我们更有书卷气。比如我们见面就问“你吃了吗”，餐桌上喜欢对客人说“请多吃”，全是大白话。而他们则会说“请用、请慢用、请多用”。这些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给人感觉比较雅。他们给人写信，甚至是学术会议的邀请或者是一个通知，里面的语言和格式，都让人感觉出撰写者的学养。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缺乏这方面的修养，包括一些教师在内，他们给港台的文化人或教授写信，也都是满纸的、了、吗、呢的大白话，读后毫无典雅的感觉。收信人一看就觉得很吃惊：怎么大陆的人说话跟我们传统的那套表达方式都不太一样？有感于此，这些年我在清华开了一门课，叫“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曾子墨：好，有请彭林教授给我们演讲《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今天的演讲我想讲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周公“制礼作乐”，二是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三是儒家礼学思想的边缘化。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那么这个礼仪之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通常我们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开国之初。周公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物之一，史书把他的最大的一个贡献称为“制礼作乐”。

大家知道，商朝是3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青铜文明。我们现在博物馆里看到许许多多最为精美、最有气势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商代的，像司母戊大方鼎、妇好三连甗、四羊方尊等。但是，这个朝代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非常发达，但是在精神上，它却是一个侏儒。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几乎都是商王和贵族占卜的记录。他们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真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明天天气好不好，昨天做了一个梦，乃至他的配偶要生孩子了，统统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认为他这个国家是天给他的，谁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又非常的残暴，我们讲到商朝的历史，总会提到它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谓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用几十人，甚至二三百人去殉葬。所谓人祭，就是在祭祀的时候，拿活人做牺牲，就如同牛羊豕那样。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商王完全失去了人心。武王克商的时候，其实当时周，不过是偏处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力跟商相差很大，不能相比。但是，他们懂得用“德”来收揽人心，因为谁都喜欢有道德的领袖，不会喜欢无道昏君。所以许多国家都愿意归附它，希望跟随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大家知道，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王调集的军队有七十万人，结果是前军倒戈，士兵起义了。这场战争，只用了一个早晨的时间就结束了。一个那么强大的商王朝，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说倒就倒了。这样一个局面，让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能相信。《史记·周本纪》上面记载，晚上两个人都睡不着，就在一起讨论商朝灭亡的原因，怎么样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辙，怎么样才能长治久安。正是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除此之外，商人那么迷信鬼神，为什么上天却没有保佑他们呢？可见得天命是靠不住的，今后不能再迷信什么天命，而要注意民心的向背，要考虑到民众的感受。从《尚书》中我们可以看

到，周公反反复复谈到要把民众作为治国的重心，他引先人的话：“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鉴”，就是镜子，我们常说以铜为鉴、以人为鉴，以史为鉴，其中的“鉴”字都是当镜子讲。他说不要拿水当镜子，当于民鉴，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反映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一面镜子。这个思想非常了不起，后来成为我们古代人本主义思想的一个主旋律。从《左传》到《荀子》，有关以民为本的论述，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殷人很相信天和天命，认为天就是主宰万民的鬼神。周人也讲天和天命，可是他们把天的内涵置换成了“民”，他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你看后来到《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再到后来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源于周公的这个思想。所以我们说，在殷周之际，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转变。这样一个转变的意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王国维先生是我们清华的前辈，他有一个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论》。在《殷周制度论》里面他一开头就讲：“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之团体”，要用道德把贵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维系起来。这个转变的实质，是我们中国的思想界实现了由鬼道向人道的一个飞跃，这是了不得的。经常有同学对我说，古希腊的神话非常灿烂、非常丰富，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神话就不如他们？我回答说，这个恰恰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我们的战国时代，古希腊还处在神话时代，它还生活在神的阴影之下。而我们中国呢，早在西周之初就已经走出了神话时代，进入了“人本主义”的时代，或者叫“民本主义”的时代。所以说，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全世界范围是早熟的，而且是非常成熟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把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说明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是从周公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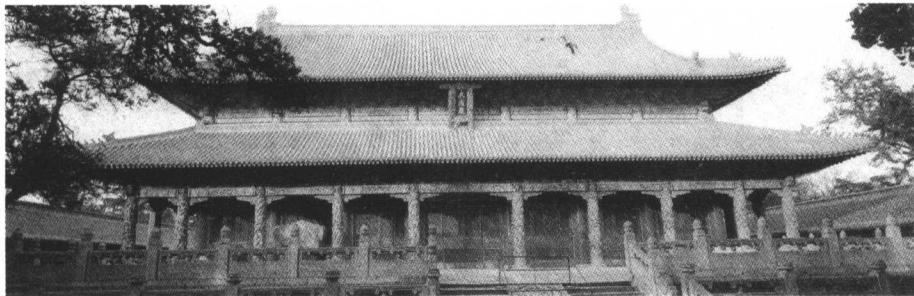
第二个问题，关于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那么好了，周人意识到要尊重人，哪怕是一个小民，是一个鳏寡之人，都不要欺侮他，而是要尊重他。那么，作为一个人自身，我们怎样做才能被人尊重呢？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对不对？所以说，作为一个政府来讲，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而不光是要把经济搞好。如果经济

上去了，人都很有钱，但是民众的精神面貌非常差，那这社会是不能进步的，甚至要灭亡的。商王朝被灭亡就是一个教训。大凡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思想家，在推出他改造社会的一套理论体系，或者一套方案的时候，他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套东西怎么样最大限度地跟人自身的特点切合。这个切合点找得越准，他那套理论推行的效果就越好。儒家非常高明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所有的政策要顺应人性。

儒家认为圣人治理人民，总是会顺应“民之道”。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做什么事，只有遵从客观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儒家说：大禹治水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大禹懂得“水之道”。秦人的祖先造父，非常善于养马，《史记·秦本纪》里面有记载。为什么造父养马能养得很好呢？因为他懂得“马之道”。周人的祖先叫后稷，后稷种地种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地之道”。所以说万物“莫不有道”。你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首先要了解这个对象有什么特点、什么规律。“水之道”“马之道”“地之道”，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赋予它们的规律、特性，这种东西你没法抛弃它，只能顺从它。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呢？儒家认为，人之道就是人性。人性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



唐吴道子孔子行教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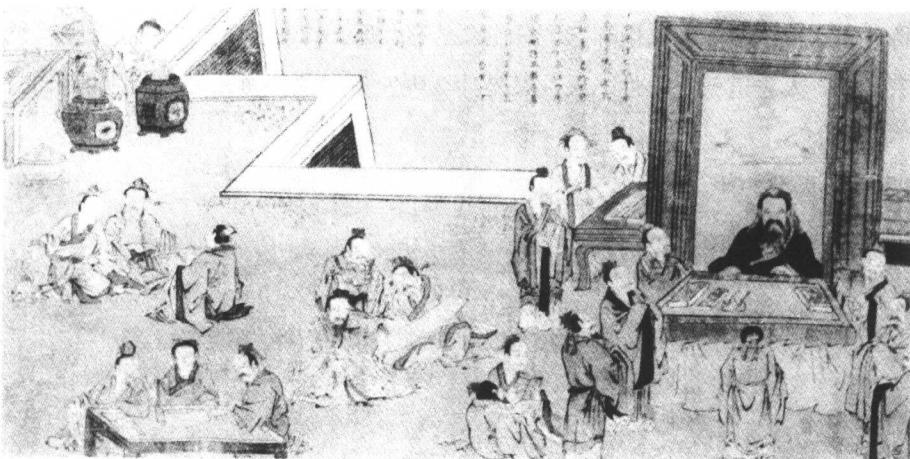


孔庙大成殿

不学而有、不教而能的天性，主要是指人的发出喜怒哀乐之情的本能，这是你生下来就有的“人性”。治理人民一定要尊重、要顺从人的这种“性”。人的这种天性，在你睡着的时候是表现不出来的。只有在外物影响你的时候，你才会做出反是喜、是怒、是哀、是乐等等的反应，并且表现出来，这就是“情”。儒家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人性是通的。你喜欢的东西要老百姓也喜欢，要天下同乐。所以就提出了尊重人性的理念。从商朝的把人不当人，到周朝的不仅要把人当人，而且要尊重他的喜怒哀乐，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简单，儒家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其实不然，尊重人性只是一个前提，只说了问题的一半。为什么？因为人性有弱点。这个人是从动物界进化来的，人性与动物性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动物身上的那些不好的习性，其实在人身上都有。比方说贪婪、残暴、争斗等等，这些东西人身上有都有。

所以，儒家认为人性不能放纵，人是万物的灵长，人应该对自己的性情有一种理性的把握。我们平时经常听到有人赞扬某某是“性情中人”，我说这要看是什么场合。如果片面强调性情，只要是真性情，我想怎么做可以怎么做，那这个社会非乱套不可。



孔子不仕退修诗书图

泰森跟人家争论，起急了，“一时性起”，把人家的耳朵给咬了。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也是一时性起，好家伙，拿榔头砸死了几个同学。如果人人都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所以儒家认为，人性是要靠理性来把握的。要把握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要保持一种性情，要不偏不倚，既不偏激，也不消沉才是。《中庸》我想很多同学都读过。《中庸》开头一句话叫“天命之谓性”，什么叫“性”呢？就是赋予你的生命的喜怒哀乐之性。《中庸》接着说“率性之谓道”，“率”就是沿着，沿着人性去治理他，庶几乎就是治民之道了。那么人为什么还要接受教育呢？因为人性有弱点。任何人不可能一生下来的时候，他的人性就是不偏不倚的，更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偏不倚。所以人性需要修正，这个修正就是教育，所以《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那么拿什么来教呢？就是拿“礼”和“乐”。“礼”是一种行为规范，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孔子有一个高足叫做子游，有一天他和有子在街上闲站，忽然看到一个跟爸爸妈妈走丢了的小孩在跺脚痛哭，跟丧事里孝子痛哭的样子有些相似。这个时候有子就借题发挥了，他跟子游讲：你看你看，孩子一旦跟他父母走丢了，那个悲伤啊！你看看，又是跺脚、又是哭、又是喊。人性就应该像这样，不要约束他，让他去尽情发泄就是了。可是在丧礼里面，对于孝子的号哭和跺脚却是有限制的，不许成天这样，只有在重要的仪节中才可以，而且每回只能跺九次脚，这时旁边会有人告诉你，这时候你要节哀。有子对这种规定很不理解，他说，为什么要叫人家节哀呢？应该让他尽情发泄悲伤之情嘛！他早就想把丧礼里面的那些规定给去掉了。有子觉得自己讲得很有道理。可是子游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此戎狄之道也”（“戎狄”是指古代那些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礼道不然”，“礼道”的宗旨，是要教育大家学会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如果是父母刚死，你不能顺变节哀，而是没有节制的号哭、跺脚，把你哀恸之情尽情地发挥，结果呢，以死伤生，那边刚死一个，丧事还没办完，这里又伤一个。这难道是死者愿意看到的结果吗？所以，孝子要懂得节哀。这个“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礼节”，“礼”都有节、有度，为的是合理地节制你的情感，而“戎狄”之邦文明未开，是不懂得这种道理的。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孝子。另外一种人，就是说父母去世了，他不念父母之恩，毫无悲伤之心。那怎么办？有办法的。古代为什么死了人以后子女要穿丧服？这是礼的规定，你必须得穿。丧服的作用之一，是要提升你内心的悲伤。你早晨起来一看，怎么穿这样的衣服了？一想，自己有孝在身。那么你看着这身衣服，你就会想起老人家生前对于你的种种慈爱，对于你的养育之恩。如果你的哀情达不到，它会帮你提升起来。对于那些哀恸太过了的，则有种种仪节来把它压下去，不能以死伤身。达不到的要把它提升起来，你应该要有悲伤的，你不能这样无所谓的。所以说，儒家关于丧礼的各种规定，就是要把人的心性达到合于礼的一种境界。《中庸》里面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你的喜怒哀乐发出来都要恰到好处，要合于道的要求，不能大喜、大悲、狂躁等等，这样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文明时代的人，是一个脱离了动物境界的人。

这个“礼”就是规范你的行为的。有同学讲，你不是说礼乐教化吗？你光讲礼，还有乐呢？

儒家说的“乐”，从根本上来讲是指人的心声，人心为物所感，就会“情动于中”。一件事情感动我了，我就会喊出来：“真好！”我是情不自禁的，我要“形于言”。可是我觉得光说“真好”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于是“言之不足”我还要“嗟叹之”，“哎呀！真棒啊！”有时这嗟叹之还是觉得不足，我就会“咏歌之”，我想唱歌来抒发情感。如果咏歌之还是不足，我就会不知不觉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起来了。可见这个“乐”，它是表达人类感情的一个东西，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文化现象。儒家高明在哪里呢？儒家提出了声、音、乐三分的理论。动物的各种叫声和自然界的各种声响，都属于“声”，这是人和动物都能感知的。但是人比动物高明，人发现了1234567的音阶，而且懂得用旋律、声调来配合，创作出各种风格的乐曲，用它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儒家把所有的乐曲都称为“音”，它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人懂得制作和欣赏“音”，所以《礼记·乐记》上讲“禽兽知声而不知音”。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音”啊，是包罗万象的，像今天的什么摇滚啊、“重金属”啊、抒情歌曲啊、雅乐啊、流行歌曲